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在遵义的见闻和经历片断忆述
……陈福桐（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潘名挥（47）

陈铁与八路军将领的接触及其与卫立煌的关系
……朱振民（69）

黔南事变钟钟山教授在遵义……李季超（86）

缅怀先师钟钟山……张志乡（89）

抗日时流亡遵义建国后眷恋名城
——名作家端木蕻良的来信和赋诗
……陈福彬（90）

抗日时期的朱穆伯老师……刘　厚（93）

回忆去抗大学习的一段经历……吴东荟（103）

抗战时期大学生活的回忆……王树仁（112）

黔南事变见闻……余明璋（120）

抗日战争中的家乡部队——八五师　陈德明　口述
……姚世达　整理（123）

忆一〇二师的几次整编　曹文彪　口述
……于双军　整理（137）

我所知道的一〇二师　杨遵宇　口述
……于双军　整理（14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抗日战争时期的遵义兵役……陈德锟（147）
中统与遵义大逮捕……沈德海（155）
我所知道的遵义第一所幼稚园……陈蕴玉（164）
贵州战时儿童第三保育院点滴回忆……刘德修口述 郑星会整理（166）
在抗战中诞生的遵义中华圣公会……杨相华（168）
在遵义的国民党军官外语班……章英奇口述 翁仲康整理（174）
《黔声日报》史略……金瑞端（177）
从“九·一八”到“七·七”……于取军提供（200）

抗日战争时期在遵义的见闻和经历片断忆述

陈福桐

这篇《抗日战争时期在遵义的见闻和经历片断忆述》，仅仅是个人极不完全的一点回忆和查到的点滴资料，把它综合记录下来，供研究和调查遵义情况的同志参考，错误之处，请指正。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继续以武力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国民党蒋介石持不抵抗主义，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集结他的主要兵力向江西苏区进攻，致使日本军队猖狂地向冀东和上海进行侵略活动，企图灭亡我们的国家，奴役我们的民族。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晚上，驻在北京郊区芦沟桥的日军，在日本陆军参谋部的指挥下，举行军事演习，借口有日

本士兵一名失踪，强行要进入宛平城搜索，我国守军在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和支持下，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本侵略军在我们的国土上肆无忌惮地公然向我国驻军进攻，当地驻军立即还击，点燃了伟大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这就是历史上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紧急号召。中共周恩来等上庐山和蒋介石的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下，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八月十三日，日本又在上海发动进攻，上海的革命志士和青年学生，有的奔赴战争前线，有的由上海转移内地。我由遵义到上海不到两个月，住在外国租界里，就和几个同乡于八月十八日由上海出来，走了几十里才坐上火车到杭州，转乘浙赣铁路车到南昌九江，再转到武汉。先后出来的有田庆昌、曾仲康、杨祖恺、卢幵熹、徐文光、夏淑芳、徐佩兰、夏维霖、胡隆均、王宥勤和从南京出来的李永康等人，多数住在武昌斗级营一带旅社里。

八月二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九月下旬，国民党通讯机关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给人民带来了欢喜和希望。但是，南京政府里有主和投降派，高级官员中的黄秋岳等通敌叛国，这又给人民带来了疑虑。

我们在武汉看到日机轰炸，也看到许多青年高唱着“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扣着臂膀”的雄壮歌声，奔赴前线战地去服务。报纸也宣传青年回乡开展救亡活动，唤起广大同胞为

抗日战争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共赴国难。十月间，一部份遵义青年就乘轮入川转回家乡了。

我在重庆的"委员长重庆行营监狱"里去探望遵义的共产党员周守儒、谢树中和罗有余。他们三人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在遵义城被捕，经贵阳转押"委员长重庆行营监狱"的（委员长就是蒋介石）。我去监狱看望他们，好些人挤在一个木栅笼子里，面容苍白，但说话还是那样慷慨激昂。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所迫，国民党不得不于年底把判刑十年的周守儒、判刑八年的谢树中释放。判刑二年的罗有余已病死狱中。罗有余，遵义火烧舟坝山人，在遵义师范第一期读书时，就从事革命活动。他的死，为遵义革命史上写下了第一个烈士英名。

回到遵义是农历的十月初冬，遵义街上还是一个远方古城的模样，就不像武汉那样经常有激动人心的场面了。塞先艾先生在北平和天津沦陷后，于九月间从北平逃难回家乡，群众请他在街上登台演讲，他告知人们：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的民族，灭亡我们的国家。遵义师范和其它中小学生也陆续上街宣传，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浪潮。

国民党贵州省的党政机关发起组织"贵州省各界抗敌后援会"，遵义也做此办理。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于一九三五年进入贵州，夺取了军阀王家烈的军政大权，也同时掌握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派一个叫李次温的特派员来当省党部的头头，实际的权力操在一个叫陈惕声的手里。陈惕声曾是在山西活动过的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他在南京国民党的组织部里作过事。他用左的一套言词来诱骗青年，引入迷途。而且他专门和贵州的革命进步势力作对。这个抗敌后援会也是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或明或暗操纵着的，遵义县党部也来包办抗日活动，利用这个组织在商店清查过日货，不过走过场而已。

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失陷，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有位中央大学的教授在当时写的一首长诗中留下了“最忆仓惶渡江时，夕阳里一片哭声相和”的句子，事隔五十多年，每一想到这句诗描绘的惨状，又联想我们从上海逃出来第一天步行一百多里，沿途看到同胞们流离颠沛的情形，再看看我们今天民富国强的现实，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的战争情况是：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十二月二十一日日军又占领了广州。在一年另三个月时间，由北平到广州这条横贯南北的铁路线以东的大部地区都沦于日军之手。国民党的主力退到大西南和大西北。由于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挫败了“皇军”的威风，国民党军队也在江苏的台儿庄取得一次胜利，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的孤军战斗的事迹，对全国人民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在人民中有了影响。从《新华日报》上知道八路军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拖住敌人前进的双脚，使敌人陷入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使我们在后方从事救亡活动的若干人有了最好的宣传材料。

我上半年到城里洗马小学教书，从江苏逃难的教师，分配在各间学校教书，以他们的亲身遭遇向学生宣讲了日军的残暴和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我和高允夫、蒋传麟还办一个油印的《怒潮》小刊，向群众散发。当时《大公报》上发表

了高兰的一些朗诵诗，这是一种宣传诗，它的词句铿锵简明，朗诵起来，激动人心。省教育厅的巡回施教车到遵义，利用它的麦克风在遵义群众中，由傅琏、王明二等女生朗诵，受到群众的喜爱，遵义师范的一些进步学生也办起壁报，由学校贴上街头。

国民党用遵义各界抗敌后援会名义组织一个“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青抗”）共产党员谢树中、傅邦瑞、曹杭章；国民党员刘云庆、王继文等，青年群众潘名挥、李伯谦、高允夫、曾仲常、张淑惠、刘丽君等为抗日救亡，大家合作得很好。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是委员陈裕森，总干事孙庆禄，对待青年活动，采取敷衍应付态度；那位组织干事宇枕涛、宣传干事刘学文和一位叫项思麟的，却出面东一干涉，西一阻挠，大家只好把活动中心由县党部转移到傅邦瑞和潘名挥家里，他们的家都在闹市丁字口街。

谢树中要我参加了“青抗”，因为我是国民党员，方便和国民党的几个人打交通；还要我和潘名挥、傅邦瑞等办一个宣传抗战的大型壁报。那时遵义没有报纸，贵阳出的报纸要三天才到，重庆出的报纸到得更迟一些。我们决定出一张日日壁报，取名《活路》，有时事消息，还有一篇短评，短评内容是根据《新华日报》社论来定论的。中共中央曾经宣布：“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短评就提出要为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幸福而努力。蒋介石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短评就引用这段讲话来发挥全民抗战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主张抗战要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写的《会歌》最后两句是：“战斗，战斗，冲锋向前，冲到鸭绿江边。”这

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会歌》是我写的词，潘名挥作曲。

《活路》张贴在丁字口曾仲常的“新生百货店”门前，以便于照看和保护，新旧两城的群众都喜爱这张壁报，有“观者如堵”的景况。为了把《活路》的影响扩大，方便更多的群众知道抗战的消息，又叫中学生陈福彬、沈大新等，抄写《活路》的大要，用《游击队》作报名，每次写五张贴到距城中心远一点的街道。后来因为国民党党部有的人不愿见到《游击队》三个字出现在街上，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办了几期就停刊了。

“七·七”周年纪念时，决定编出《抗战建国周年纪念专刊》，国民党公布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所以用了“抗战建国”四个字。遵义在清末设有官书局，用铅字印过《白话报》，后来印刷机毁坏了。这本专刊是用石印，上面有一篇告同胞书，还有曹杭章、黄生民合写的文章，曾仲刚自前线寄回来的一封报导战场斗争情况的信。

“八·一三”周年纪念时，“青抗”还在舞台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和《扬子江暴风雨》等剧。遵义在三十年代演“文明戏”，后来叫“新剧”。现在才叫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是街头剧，我演卖艺老人，刘庚书演女儿。演出地点在播声电影院。庚书的九妹宜书上台独唱，都是开遵义女子上台演剧和独唱的先风。演《扬子江暴风雨》那一夜里，持票入场的人形成拥挤，场内秩序混乱，抓住了伪造的入场券持券人，他们说是县党部的干事发给他们的。第二天“青抗”召开全体会员会，通知宇枕涛、刘学文等人出席，大家拿出伪造的入场券，要他们回答为什么做这样不光采的事，他们当场丢丑，无话回答。

湘潭中学校长乔光鉴带领一批湘潭中学学生，组成“飞鹰步行团”，因为男女生都打赤足、穿草鞋，所以又叫赤足宣传队。他们到遵义后，“青抗”在大悲阁小学（现在的朝阳小学）开欢迎会，国民党的项思麟在会上对宣传队指桑骂槐地说了一些诬蔑的话，引起群众不满，一位基督教徒章尚文女士也忍不住心头的愤怒，当面给项思麟以批评。抗日救亡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一场伟大的、艰苦的战争，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血性、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中国人，都应该作出他的贡献，飞鹰步行团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和激励了接受他们宣传的爱国同胞。

遵义杨柳街小学，后来叫老城小学（即现在的文化小学），它是清末遵义废科举后设立最早的一间学校，当时叫模范高等学校，一直起到全县小学的率先作用。一九三五年后，余选华、吴开治先后担任校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吴开治聘请共产党员谢树中、杨天源去教书。他们两位都是从监狱放出来的。吴开治敢于聘请他们，在当时确是一件勇敢的、正义的举措。说到这里，又要提一提当时的遵义的专员兼县长刘千俊这个人。红军长征过贵州，国民党的中央军乘机进入贵州，军阀王家烈垮台，贵州行政区划改变，在省县之间设一个虚级的专员公署。遵义是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先是一个作过师长的甘芳任专员，一九三二年春刘千俊来继任，还兼任遵义县长。刘千俊的秘书刘慕曾、行政科长严道生、教育科长吴羽仙都是他们的湖南同乡，这些人在历史上是什么因缘，读过些什么书，曾参加些什么活动，也许开治先生清楚。刘千俊到遵义后，他接近赵乃康先生，接受赵先生意见，从四川接回郑珍先生的后裔郑昌，每

年组织遵义各界到西门寺沙滩去为郑珍先生扫墓。遵义师范教师余正邦先生（解放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名高羽），从监狱出来，师范学校不敢再聘请他去，刘千俊就聘他去作家庭教师，教他的儿子刘云飞。一九三八年，余正邦向刘千俊提出，他要去延安学习，希望成全他的意愿。刘千俊允诺了这一请求。正邦、开治是好朋友，刘千俊对于这位小学校长也像对于他的家庭教师一样表示尊重，常常约去谈话，表示一点关注之情，因为这样，老城小学才敢于聘请一些被国民党戴上红帽子的人去教书。天源是个劲气内敛的人，他是遵义地下党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他在“青抗”的活动中，从不露面，但演出活动时，他和魏丹若担任了舞台监督，在后场管理得有条不紊。树中是红军长征时的游击队员，一九三六年作过临时县委书记，他是老成干练，敢于冲闯的青年，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十分忌恨，派刘学文到老城小学去教“公民”课，即是政治课，就是借此监视树中。刘学文把学校高年级学生拉拢和诱骗到县党部去开会，这是损害少年精神和影响学业的行为，学校又无法阻止。谢树中一面退出老城小学到别的学校教书和做家庭教师，一面又提出要我转到老城小学担任训育主任和六年级级任教师。我到老城小学以后，提出两条主张：一、我是国民党员，有资格教“公民”课，刘学文就不必来了；二、我制了一根教鞭，发出警告，没有我准许，任何学生不得到任何地方去参加开会。就这样，这间学校真是净化了。我写了校歌的词，潘名挥作谱。歌词内容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的大时代精神。这间学校的教师中先后进去的大约有十个共产党员。有了这个红色基地，才有力量在遵义开展这种革命活动，才能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

的斗争。

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叫重庆为陪都。遵义成为“陪都”的屏障。国民党的陆军大学迁来遵义，设在较场坝老营房，现在遵义医学院地方。陆军大学的将官，多数是将军，他们携妻带子逃到这西南公路的枢纽点来，过着寓公般的生活。跟着迁来的有上海餐厅、江浙餐厅、南华酒家等在当时是称为高级的餐馆。每当夜幕拉开，光亮如同白昼的打气灯高悬的时候，达官贵人，太太小姐就进入餐厅了，将军们在美人醇酒的迷醉下，真像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亡国景象，令人叹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怎么得了啊！无怪于人们要指责蒋介石训练的亡国将军，在一年时间就丢失了祖国半个大好河山。“青抗”的歌咏队这时就手挽手地上街唱歌。“青抗”歌咏队的指挥潘名挥出钱选印了一本《抗战歌选》，是他誊写的原稿。选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河里水、黄又黄》、《芦沟问答》等几十首歌曲。我还同他合作写了《保卫大武汉》。歌咏队员们是愤怒地、悲痛地唱这些歌曲的。鲁迅在肖军的《八月的乡村序》中写道：“爱仑堡说‘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遵义就出现了这种现状。鲁迅还引了一句民间谣谚：“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遵义算得一个“行在”，迢迢几千里跟着来买酒醋的商人，确也一个个都富有起来。

重庆开明书店有一位姓王，一位姓方的两伙计来遵义开设一间“开明书店”，常常买几本进步书刊，有一天摆出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书，谢树中叫我买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十分欣喜，第一次能读到这位伟大人物的著作。我从小学高年级起，读过《四书》和《孟子》，读过孙中山的《中山丛书》读过鲁迅、郭沫若的一些作品，读过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佩服这些人，信仰这些人。今天一读到这位指挥中国人民革命的领袖的著作，境界更宽阔了。毛主席在这本书里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对国民党的片面路线和妥协投降路线作了必要的揭露。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情绪。我们在《活路》上写了文章，老城小学还用各种颜色纸，裁成一米见方大小，写“抗日战争三阶段——敌进我退，敌我相持，敌退我进。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样的若干张标语张贴街道。后来还贴到农村里去。

说句公道话，遵义的共产党人是本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愿意真诚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其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而国民党县党部那几个人总是不舒服，明枪暗箭不停地向“青抗”射来，他们搞演剧唱歌来唱对台戏，办《扫荡》壁报来“扫荡”《活路》，支使宪兵营的人出来放空气说“协记油绸店”里有收音机收听延安广播（油绸店里后面住有傅潘二家）。秋末冬初时，准备秘密逮捕谢树中，他不得不急去延安。这时县党部委员陈裕森走了，新任的头头先后有董辟疆和宋正苍。总干事是个姓马的。专员公署搬桐梓，刘慕曾作遵义县长。冬季的一天（记不清具体时日了），吴开治从县政府回来说：“刘县长对我说，县党部准备明天召开各界抗敌后援会委员会，要提出傅、潘、陈、曾等人办《活路》壁报纯是为共党宣传，准备逮捕人。你去

的几个有声望的委员在会上提案，以不出事为好。”怎么办呢？就由吴开治、杨天源去找赵乃康、朱穆伯先生，请他们明天到会把国民党的提案设法否决。

赵先生是《续遵义府志》总纂，一生从事汉学的研究，红军长征过遵义时，徐特立老人曾经要他把各家所藏图书集中起来办个图书馆，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也去请他讲过书，赵老一生不入公门，声望颇高。朱先生是北大文科毕业的，三十年代在贵阳教书和马君亮、李淑元先生有“三怪”之称，他在三八年向谢树中、杨天源提出、要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各界抗敌后援会开会，县党部果然如刘慕曾说的一样，要想通过会议决定捕人，两先生以青年爱国无罪为理由，予以驳斥，刘慕曾也含糊应付，县党部使出来的阴谋诡计没有响应。最后他只得撕破脸皮，把《活路》壁报板抬走，解散了“青年抗日救国会”。

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他的老婆陈璧君带着陶希圣、周佛海、曾仲鸣等几个“党国要人”飞逃越南河内后，发出了叛国投敌的“艳电”（即这年的十二月十九日），还有他的党羽陈公博、高宗武、林柏生等也在上海公开投敌。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声明，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的状态”。同时确定把抗日为主转向为反共为主，先后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处理办法》，准备取消陕甘宁边区，制造和进行了“平江惨案”一类的反革命行动。中共中央七月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

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毛泽东主席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还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这一年是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直延续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在这样的情势下，遵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受到的阻力和破坏是很大的。

“青抗”被解散，正值遵义民众教育馆组织“民众话剧社”，馆长胡滋椿，教导部主任詹健伦，体育部主任黄宝书，干事张季立、傅邦瑞等决定接纳“青抗”歌咏队成员去活动。这就使“青抗”的工作继续得到开展。大家还应刀靶水绅士吴瑶阶的邀请，步行几十里到遥和镇去庆贺开镇典礼，为几千农民群众演剧唱歌。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有一个巡迴合唱团到遵义，民众教育馆就依靠话剧社这批人和他们联系活动，以尽东道主之谊。女队员都住在老城小学，其中有讲究“摩登”烫头发的，也有朴素打扮的。一位女团员唱《催眠曲》：“别想你的爸爸，你的爸爸为打仗在天涯，打死日本鬼子咱们好回家”。感动得听者流泪。合唱团负责人虞文希望在遵义留下一个音乐组织，继续他们的活动。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春风吹又生”的好时机，但是由我们这班人出面组织一个团体，国民党党部一定不准立案。杨天源才去找他的小学老师，正在做县政府督学的夏雨屏出面来做发起人，吴开治做总务股长，由我来取一个古老一点的名字“遵义音教促进会”，（以下简称“音教会”）以促进地方学校的音乐教育为宗旨，县党部才批准立案。这时傅邦荣从华北宣传队回来，他有指挥歌咏的手法，又有导演话剧的才能，就由潘名挥和他担任正副指挥。“音教会”的入会章程

规定：凡是中小学音乐教师和热心地方音乐教育的人士都可参加。因此，它的队伍比“青抗”还要壮大。秋天，举办一次全城中小学生抗战歌曲演唱，先由各校练习唱歌，抗日救亡的悲壮雄伟的声音，响彻城区角落，是一次有计划的和有意义的宣传鼓动，也是对顽固派打击抗日救亡活动进行一次示威性的抵制

三九年的元月中下旬寒假期间，老城小学组织“农村抗日宣传队”师生二十余人，教师有魏丹若、黎恒章、贺平波、姚世达、刘铭坤等，吴开治带队，杨天源管理生活，到东乡火烧舟（住梅天荣家）、羊叉坝、禹门寺一带演出，所到处，教群众和学生一起唱歌，宣传抗日战争三阶段。四〇年又到南乡的三岔河、尚稽、团溪、龙坪、深溪水一带演出，这一次，还自编自印了山歌体的儿童歌曲活页若干张，有“天上几颗星，地下几座城，鬼子占我多少地，鬼子杀我多少人，小朋友，要记清，报仇雪恨打走东洋兵”等歌，教会了许多儿童唱起来。

老城小学的同事们相约：“工作到抗日战争胜利才考虑离开去深造或做其它的事”。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后的第三天，我到贵阳的生活书店，买了一些新书回遵义，作为边教书边自学的课本，大家同时还就自己的兴趣选读书籍，决定在遵义教育界干到新中国诞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到贵州来视察，在遵义住了几天，接见了一些老年人。他的一个秘书到老城小学来教学生唱歌。一首是红军唱的歌，改名叫《炮火连天响》，歌词第一曲是“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抗日先锋队，英勇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

头颅和热血，嘿（重句），坚决与敌决死战”。另一首是陕北一间学校的校歌改名《毕业上前线》，歌词是：“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纵或有点点留念。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困难已经迫在眉尖，谁有心意长期钻研。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重句）”。这些歌收在《抗战歌选》第二集里。收入这一集的还有我们自写自谱的《缝棉衣》、《天上几颗星》和《运动会歌》等曲子，发行到全县四百多间中小学去作音乐课教材。

曾仲常在重庆进货之便，设法买来几部莫斯科中文版的《联共（布）党史》和《列宁选集》，分送给朱穆伯、杨天源和我们几个。因此，大家商议开办一间书店。杨天源到贵阳向贵州地下党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汇报得到同意后，就催促我们筹备。（这个汇报我们当时不知道）杨天源、傅邦瑞、潘名挥、曾仲常、乔剑秋、李伯谦、晏东藩、申维翰和我开了几次筹备会，决定每人入股五十个银元（可折合法币），潘名挥和他的妻子刘丽君共入两股。我们取一个新鲜的但又平常的名字，叫“快读书店”，潘名挥同魏丹若用于右任的字帖选了这四个字用幻灯机来放大。有的朋友说，国民党的人看见是他们的监察院长写的招牌，就不敢侧目而视。其实不然：这块招牌一则没有署于右任的名；二则国民党特务机关从不理睬你什么监察院长，他们只认得他们的陈先生（立夫）和戴老板（笠）。

省里派了刘星洲来作“快读书店”经理，遵义安排了李祖群、曹荒草等去协助工作，书刊从重庆《新华日报》和贵阳生活书店进货。延安的《军事杂志》、《文化战线》和《群

众》、《解放》，毛主席的著作以及介绍苏联建设的若干册子和少年儿童阅读的书刊，大量地运到遵义，开架卖书，涌进书店的有浙江大学的师生、陆军大学和军官外语班的学员和教官，各中小学的教师和广大青年，还有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一些科长。为了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请民教馆馆长胡滋椿、女中校长傅梦秋等作理事或监事，后来还请曾任过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长的李仲民作个干股东，当常任监事。这正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贵州省党部主委黄宇人到遵义来，在县党部召集党员开会，通知了胡滋椿、傅梦秋、乔剑秋和我去参加，黄宇人说，“有的党员去参加共产党搞的活动，为共党张目”。这就是为我们搞书店而提出的警告。接着宪兵三次搜查书店，刘星洲的金沙同乡刘学文又跟踪盯梢他很紧，刘星洲才离开遵义去延安，由李伯谦来接任经理，兼营一点教科书。到一九四〇年初再也拖不下去了，才出顶给肖之亮去卖文具，招牌也更换了。分股时，我们每人只得了几本书。“快读书店”的招牌撤下来时，许多读者为之感慨不已，也因此更充分地暴露了顽固派的丑恶嘴脸。

就在这年，杭州的浙江大学经江西泰和迁到广西宜山，三迁到遵义和湄潭。浙大校长竺可桢、史地系主任张其昀等几次来学校和吴开治、朱穆伯等商量解决校址问题，还借学校几间教室上课。国内著名教授苏步青、梅光迪、胡刚复、黄翼等都来遵义。浙江大学到遵义，对遵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一九四〇年

国民党继发表一个《抗战建国纲领》之后，于一九三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